

## 跨文化研究视野下的中爱关系：一项研究议程

王展鹏

中爱两国人民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自 1979 年中国与爱尔兰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关系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两国政治关系发展良好，贸易、投资大幅增长，民间交往日益频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中爱关系研究在中国和西方的学术界受到忽视，相关学术积累不够充分，两国关系史的编撰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爱尔兰都仍是一个空白。近年来，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中国爱尔兰学和爱尔兰中国学逐渐兴起，对中爱关系研究提出了现实需求，也为其深入发展提供了源头和动力。

2008 年和 2009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先后启动了“中国爱尔兰研究和爱尔兰中国问题研究状况”的调查课题。研究表明，21 世纪初以来，中国的爱尔兰研究和爱尔兰的中国研究出现了积极拓展研究领域、创新研究范式的新趋势，与此同时，两国学术界提出了建立爱尔兰的中国研究、中国的爱尔兰研究学科身份的迫切命题。在此过程中，中爱两国相关领域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将中爱关系研究视为建构自身学科身份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爱尔兰学术界，2009 年和 2010 年出版了两部关于中爱关系研究的重要著作，分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杰鲁莎·麦科马克(Jerusha McCormack)博士主编的《爱尔兰人与中国》和科克大学中国研究院/孔子学院院长凡红教授主编的《爱尔兰的亚洲战略与中爱关系》。《爱尔兰人与中国》一书是爱尔兰中国研究传统的集大成之作，内容包括中英外交史上马戛尔尼伯爵觐见乾隆皇帝、担任清朝总税务司四十年之久的赫德爵士的在华经历、爱尔兰在华传教士的工作、庄子对王尔德思想的影响、双方的音乐、园艺交流、爱尔兰人对中国城市化、商业文化的理解以及爱尔兰中国移民的生活状况等，呈现出研究范式的继承与创新的新特点。凡红教授主编的《爱尔兰的亚洲战略与中爱关系》则反映了近年来爱尔兰孔子学院、中国研究院建设过程中在中国研究领域的新探索。与传统西方汉学不同，他们更为关注两国现实的政治、经济关系。该书对 1999 年爱尔兰政府亚洲战略的缘起、发展和前景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并从政治、经济、商务、文化、教育等层面讨论了该战略在双边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对中爱关系研究中出现的这一新趋势作出了积极回应。北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在爱尔兰政府的资助下启动了中爱关系研究项目，旨在立足中国学术界

的研究成果，同时积极吸收爱尔兰同行参与，在学术对话和交流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中爱关系相关经验知识的积累，开拓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本书即为这一研究项目成果，它在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跨文化解读、文学关系和文化交流、发展模式的相互启发等层面对中爱关系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多视角、跨学科研究。

中爱两国在文化传统、地理环境、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差异很大，但自近代以来，都曾有过遭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历史遭遇，近三十年来都通过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走上各自民族和文明的复兴之路。这一共性和差异并存的状况为我们以跨文化视角解读两国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了空间。

## 一、跨文化视野下的中爱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取向

跨学科研究取向不仅是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中爱关系这一研究领域的特点使然。中爱关系这一广义范畴既包括传统政治关系、政府外交、经贸关系等传统议题，也包括民间外交、文化交流、商业文化等议题，涉及两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方方面面。在解读两国关系的历史的过程中，需要布罗代尔式的总体史观，将社会生活不同层次的全部内容纳入研究视野之中——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心态、人口等因素概莫能外。这些因素相互重叠、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整体。在研究过程中，既需要政治学者关于两国关系的概括性的抽象总体判断，也需要历史学者对有关历史细节的孜孜追求，文学研究者的想象和对文本的细读与阐释。前期研究积累的相对不足也要求我们注重历史档案的发掘和有关事件的亲历者的个人经验，将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结合起来，既关注两国关系中的宏大叙事，也致力于具体、细微的个案研究。

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以政治经济关系为主线的外交史，更多的是通过学者的文献研究和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对广义的中国与爱尔兰两国及两国人民间的文学、文化、思想、社会、经贸乃至政治联系做出历史叙述，其中包含着部分个人的历史（如文洁若、傅浩翻译爱尔兰文学作品的经历；包柏德在中国的个体体验），是这一历史进程中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的结合。在涉及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部分，也往往关注其跨文化交流层面的解读，对其中包含的历史、观念、文

化意义做出阐释。但无论是历史叙述还是当代问题的讨论，本书的作者始终关注其所反映的宏大的时代变迁及其与当代中国和爱尔兰社会的联系。

## 二、跨文化交流视角下的中爱关系研究

跨文化交流是中爱关系的基本特征之一，它不仅停留在狭义的文化交流层面，也渗透到两国广义的政治、经济关系之中。从历史维度看，由于爱尔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经历，爱尔兰人的民族、国家认同极为复杂。自 1169 年诺曼人入侵爱尔兰岛，到 16 世纪 40 年代爱尔兰沦为英国殖民地，在此后的大多数时间里，并不存在法理意义上独立的爱尔兰民族国家。既是爱尔兰人又是英国人的身份困惑成为一代又一代爱尔兰人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此外，虽然从人口和领土面积的意义上讲爱尔兰都是一个小国，但海外爱尔兰人的数量（约八千万）远远超过其本土，这一群体的存在使爱尔兰人的民族身份更为复杂。因而，我们的中爱关系研究的起点将远早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 1979 年，甚至远早于爱尔兰独立建国的 1921 年，在这一阶段，两国人民间的交往和文化交流构成了中爱关系研究的重点。

爱尔兰民族经历的复杂性使中国人从外部观察爱尔兰或者在与爱尔兰人交往的过程中需要超越文化差异造成的阻隔。同样，对于爱尔兰人而言，东方文明的神秘与陌生、欧洲中心主义的羁绊都会给双边交流与相互理解带来一定的障碍。同时也应看到，历史上爱尔兰人文化心理中既有昔日大英帝国殖民者的思维方式、又有被压迫民族追求平等的愿望的二重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两国人民交往中跨越文化障碍的有利因素。与传统西方主流话语中居高临下教化东方人的殖民心态不同，从赫德爵士和爱尔兰在华传教士的活动看，爱尔兰人往往能够以更为平等的心态看待中国，具有融入中国社会的意愿。

赫德爵士在中国的经历是爱尔兰人与中国交往历史上的典型案例。赫德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四十年之久，在中国海关制度发展、官方统计制度等方面贡献颇多。一些研究者注意到，爱尔兰血统是赫德在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爱尔兰民族历史形成的多重身份的复杂性、注重家庭、关系乃至多少有些裙带作风的传统和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固有元素产生了共鸣，成为跨越东西方文化障碍的积极力量。

21 世纪以来，跨文化交流在中爱关系中呈现出多维度、多层面的特征：从政府外交政策到个人生活、从政治经济到文学艺术领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本书中，高咏梅对爱尔兰对外政策的研究发现，以文化外交为基础的软力量战略在爱尔兰对华关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且在近年来有逐渐加强的趋势。麦科马克教授通过对大河之舞在中国传播获得巨大成功的当代案例，表明大河之舞是爱尔兰人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将自身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多重身份认同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优秀艺术形式，对面临类似挑战的中国观众而言具有独特的魅力。爱尔兰都柏林市政府官员海登和戏剧导演思凯芙则分别讲述了自己作为“都柏林市中国春节”庆祝活动的策划人举办这一活动和利用在中国排演爱尔兰戏剧创造跨文化对话空间的经历。

近五年来，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中国研究院依托该校商学院一直进行中爱商业文化的跨学科研究。该项目从商科、社会学等视角对中爱商业文化乃至更广义的两国文化传统进行了实证研究。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中爱两国由于历史经验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在文化上的共性远远大于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观点。这一研究不仅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长期存有争议论断，也为两国企业家的投资、合作提供了借鉴。爱尔兰科克大学中国研究院/孔子学院凡红教授关于中爱教育交流的研究表明，爱尔兰孔子学院建设促进了爱尔兰公众对中国的了解，使 21 世纪的爱尔兰人能够更有效地与中国打交道。从更广义上说，教育日益成为爱尔兰人“跨文化自觉的代理者”和两国“未来商业关系的促进者”。

### 三、文学关系在中爱关系中的独特地位

爱尔兰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在两国人民交往的历史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也是这一课题的研究重点，篇幅占本书的一半以上。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对爱尔兰文学的接受史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两国人民在实现民族独立、文明复兴过程中关于自身和世界的看法的变迁。五四运动后，鲁迅、茅盾等文学巨匠就注意到爱尔兰文学鲜明的民族特性及其洋溢着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民族民主革命和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对爱尔兰作家以自己的作品真实记录的爱尔兰民族发展的体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人对爱尔兰文学作品的认识也随着我们自身的改变而发展。今天，爱尔兰作家对本民族融入全球化进程经历的记录和思考也给予了我们诸多崭新的启示。

我国学者蒲度戎提出，近百年来，爱尔兰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经历了发生期（1919年前）、发展期（1920至1949年）、萎缩期（1950至1979年）、繁荣期（1980年以来）四个时期。在每一时期，都诞生了令中国人民为之振奋的翻译和介绍作品，如《海外轩渠录》、《莎乐美》、《牛虻》、《尤利西斯》，“见证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史的进程”。同时，中国读者对王尔德、肖伯纳、乔伊斯、希尼等爱尔兰作家及其作品接受史的变迁也映射出中国自身发展的历程，给予中国研究者发挥主体意识，进行理论上总结、阐释、创新的空间。

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来看，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在两国人民间的交往中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在中国对爱尔兰文学作品的译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正如陈恕教授在本书中写道：

文学既然被认为是民族心灵的历史，那么从本质上说，从事文学翻译就是推动世界各族人民之间心与心的交流，就是架设通向理解和友谊的桥梁。这座爱尔兰和中国文化交流、理解和友谊的桥梁由我们文学的先行者鲁迅和茅盾架起，现正由文学艺术界的人们进一步拓宽和加固了。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关于两国文学关系研究的绝大部分成果还都是爱尔兰作家、作品在中国传播的案例。与之相比较，中国文学在爱尔兰的传播（其数量和影响都非常有限）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在本书中，我们只收入了麦科马克教授关于中国文化对叶芝创作《青金石》一诗的影响一文。北外爱尔兰研究中心所做的爱尔兰中国研究调查也表明，爱尔兰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文化典籍翻译与介绍的数量十分有限，有关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更是凤毛麟角。在我国积极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这一现状也向我们提出了在海外加强中国文化，特别是加强文化经典和当代文学作品译介工作的紧迫命题。

#### 四、公共外交的跨文化属性及其在双边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文化是国家软力量的重要来源，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资源和基础，同时赋予了公共外交以鲜明的跨文化属性。这一属性也决定了公共外交作用的发挥往往不一定需要借助宏大的事件，而是需要更多地关注细节，通过机构建设、个体间的交往乃至个人的体验，在润物细无声之中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除传统政府外交外，包括民间外交在内的公共外交在中爱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英爱殖民时期来到中国的赫德爵士和爱尔兰传教士，还是当今的大河之舞、孔子学院都起到了加深两国人民了解的载体的作用，尽管我们可能对赫德爵士或爱尔兰传教士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存在不同评价。借助跨文化交流，爱尔兰人有机会了解真实的中国，中国人也获得了关于爱尔兰的真实的知识，事实上相互起到了向对方“公众表达本国国情……提升本国的形象”的功效，进而提升各自国家的软力量。

近年来，在中爱两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双边文化交流、教育合作在促进两国人民间深入了解和全方位合作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和科克大学孔子学院的建设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的建立成为两国间公共外交和跨文化交流发展的成功案例。北外爱尔兰研究中心的调研表明，孔子学院/中国研究院和爱尔兰研究中心建设不仅有力推动了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而且成为促进两国人民间友谊和理解的重要桥梁。在爱尔兰，历史上的中国研究规模较小加之英爱特殊关系的限制，其研究成果局限于英爱殖民时期爱尔兰人与中国交往的历史，而学术界有关中国的知识的来源则主要借助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出版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普通爱尔兰人对中国的了解，使之往往难以作出关于中国的独立、客观的判断。以孔子学院的建立为契机，爱尔兰中国问题研究的领域得到拓展，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模式 and 双边交往成为孔子学院的重要教学与研究内容。同样，中国的爱尔兰研究在探索自身学科身份的过程中，也将爱尔兰学的研究领域从传统的文学、文化研究拓展到爱尔兰历史、社会乃至政治经济领域。与传统西方爱尔兰研究过于强调批判解构的视角相比，中国的爱尔兰研究不再将爱尔兰复杂的现实简化为一个后殖民的案例，而是从历史、经济、社会等角度对爱尔兰的国情做深入扎实的研究，获得关于爱尔兰民族特性及其当代社会更丰富、全面的认识，避免陷入简单化和文化误读的误区。孔子学院和爱尔兰研究中心推广两国文化的工作，有助于在不同文明的比照过程中，更好地了解对方、认识自我，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创造了条件。

## 参考文献

陈绛:《译后记》, [美] 布鲁纳、费正清、司马富:《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陈绛译, 北京: 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5 年版。

[爱] 杰鲁莎·麦科马克:《爱尔兰人与中国》, 王展鹏、吴文安等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蒲度戎:《爱尔兰文学译介与研究在中国的百年述评》, 2009 年 12 月 4 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的庆祝中爱建交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Li, Lan, Cathal Brugha, and Liming Wang. “Irish and Chinese Business Culture Similarities and their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as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2<sup>nd</sup> CEA (UK) and 3<sup>rd</sup> CEA (Europe) Annual Conference. Dublin: UCD, July 14–15, 2011.

Fan, Hong, “Connecting Cultures”, in Hong, Fan, and Jörn-Carsten Gottwald, eds., *The Irish Asia Strategy and its China Relations*, Amsterdam: Rozenberg Publishers, 2010.

Jerusha McCormack (ed.). *China and the Irish*. Dublin: RTÉ, 2009.